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主办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河南大学出版社

1
2008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第1卷(第1期)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第1卷(第1期)/苗长虹主编.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81091-932-6

I. 黄…³ II. 苗… III. ①黄河流域—文化史—丛刊②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丛刊 IV. K292—55 X2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0622 号

责任编辑 杨风华

责任校对 木 易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 hupress. 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356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顾问:李学勤 冯骥才 陆大道 孙九林 牛文元
陈栋生 王 巍 马润潮(美) 李福清(俄)
戴福士(美) 吉尾宽(日)

主编:苗长虹

副主编:覃成林 高有鹏 牛建强 刘东勋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创琳	王蕴智	孙一飞(美)	许学工	刘彦随
李小建	李玉洁	李振宏	张大新	张云鹏
张新斌	杨云彦	杨伟聪(新)	杨朝明	侯甬坚
耿明斋	晁福林	秦耀辰	康保成	程民生
樊 杰	魏也华(美)		魏后凯	戴松成

执行编辑:吴朋飞

主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
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卷 首 语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作为母亲河的黄河，犹如一条巨龙，蜿蜒奔泻，波澜壮阔；博大雄浑，容纳百流；裹挟黄土，塑造沃野；孕育了悠远深邃、绚丽多姿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彰显了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因此，开展黄河文明及沿岸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创建以黄河为对象的“黄河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应有之义。

今日的黄河流域，由于受自然生态变迁、地理区位变化、历史传统影响等因素的作用，失去了中世辉煌的历史地位，社会发展水平整体上还处于欠发达状态。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寻求一种适合于本流域生态文明的发展之路，除了技术研究和科学决策外，从时空演变的角度寻绎发展规律也尤为必要。有鉴于此，河南大学于2002年组建了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并于2004年获批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下设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生态与可持续发展、黄河文明以及中原文化与民俗等4个研究所。依托地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区域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古代史、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博士点，地理学、历史学、应用经济学、中国文学等博士后流动站，通过经济、地理、历史、文学、哲学等优势研究力量的整合，构建文理交叉、多学科渗透的研究平台，形成了黄河文明的承传与发展、沿黄地区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黄河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鲜明特色的研究方向。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对基地的科研工作提出了很高要求，即通过组织重大科研项目，产出重大研究成果，促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协调发展，建立知识创新机制，使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居国内领先地位，并在国际相同研究领域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结合本中心的研究目标，多方咨询有关专家后，我们决定主办出版学术丛刊——“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作为海内外同仁研究和切磋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的园地。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始终遵循的学术原则。高质量，创新性，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办刊理念。我们竭诚欢迎海内外专家惠赐大作，提出高见，贡献智慧，参与共建。本丛刊就像刚刚破土的幼苗，虽然稚嫩，然却充满生机和活力。愿我们携起手来，精心浇灌，呵护培育。我们相信，有广大学者的鼎力支持和我们的不懈努力，她一定会茁壮成长，为黄河文明的伟大复兴和“黄河学”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发挥她应有的作用。

目 录

专论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新动向与新进展·····	王 巍(1)
-----------------------	----------

历史与文明

论荣仲方鼎有关的几个问题·····	李学勤(15)
商代甲骨文的发现、流传与研究 ·····	王蕴智(20)
经典新读与孔子思想再认识·····	杨朝明(54)
论先秦两汉黄河文明对南越地区的影响·····	薛瑞泽(68)
黄河流域农耕文化述论·····	李玉洁(81)
于谦与明宣德、正统间的河南地方社会 ·····	牛建强(91)
试论清代中原经贸业的发展·····	张民服(114)

民俗与文化

古代禅让政治的文化理想	
——关于中国神话传说的尧舜禹时代·····	高有鹏(128)
中原神话调查报告·····	程健君(144)
鱼的灵性·····	徐华龙(159)
游仙诗文化渊源臆说·····	陈江凤(168)
基督徒的文化认同与乡土文化变迁的模式	
——从理念与符号的视角来探讨豫西李村基督徒在葬礼上的冲突与调适 ·····	李华伟(187)
三月三,中国情人节溯源 ·····	朱淑君(200)
守望人祖的背影	
——河南淮阳民间泥彩塑“陵狗”田野调查笔记·····	王悦勤(207)
太康道情戏调查报告·····	张 绮(221)

学术信息

中心成功举办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区域文化片协作联谊会暨“改革开放三 十年文化与发展”高层论坛 ·····	(228)
征稿简则·····	(230)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新动向与新进展

王 巍

摘要:文章介绍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近期动向,并从文化谱系与年代测定、自然环境变迁、经济技术发展状况、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等课题入手,总结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的主要收获;同时指明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工作要点,且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主要认识分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文明起源 文明形态 聚落形态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作者简介:王巍(1945—),男,吉林长春人,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100006)

一、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近期动向

(一)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纷纷成立

上个世纪,中国学术界对文明起源的研究多是学者个人“单干”,缺乏有组织、有计划的“协同作战”。进入 21 世纪以来,这种情况有了明显改观。为了团结全国以及国外的研究力量,深入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河南省、山西省等单位及地方相继成立了“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采用开放式的模式,聘请了十几个国家的 80 多位从事世界各古代文明研究的专家学者及国内 200 多位相关学科的学者作为中心的学术顾问、专家委员会委员和客座研究员,形成了一支世界上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研究古代文明的学术力量。中心成立后,2001 年 8 月 1 日至 3 日,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举办“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有来自国内外一百多位学者参加会议。在会上,与会学者就文明起源的定义、文明与国家的关系、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和方法、20 世纪文明起源研究的经验和

存在的问题、今后开展文明起源研究的方向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为在新世纪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做了方向上、理论上和方法上的准备。几年来,中心积极组织有关人员参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有关项目,并与地方省市的文物考古研究机构、高校考古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一系列的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学术研讨会。中心不仅定期编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还编辑出版了60多万字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要览》,全面反映20世纪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成果与观点。

(二)文明起源研究再掀高潮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全国各地有关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特别是2004—2005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实施过程中,河南灵宝西坡、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和新密新砦以及偃师二里头等大型中心性城邑遗址及高等级墓葬等相关重要遗迹的发现,为开展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新资料,有力地推动了文明起源研究。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与各地方研究机构和大学联合召开的一系列各区域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以及北京大学等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开展的多项学术活动和出版的学术刊物,有力地促进了各个地区文明起源的研究。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活动以及出版物,促使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研究再掀高潮,成为近年来中国历史和考古学界最为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

(三)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被广泛应用

近十多年来,各种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考古与学术研究之中。研究手段的丰富,促使对诸如生态环境的变化,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的发展,青铜器、玉器、陶瓷等贵重物品的制作工艺的进步及其原料产地和流通状况,古人类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状况和体质特征等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古代人类和动物的DNA分析,利用各种方法对地下古代遗迹进行勘探,遥感考古,GIS在考古中的应用等也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环境变化,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古人类饮食结构和健康状况,资源的控制和流通等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关系的研究方兴未艾,多学科结合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研究中的作用也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多学科结合在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中“生态环境变化”和“经济技术发展”课题所取得的成果。相关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使我们对于中原地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期间自然环境的变化,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自然环境变化和经济技术的进步在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四)聚落形态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国内学术界对文明起源的研究多是通过墓葬所反映的等级制度和贫富分化来进行的,而对通过聚落形态来研究社会结构则相对较为薄弱。90年代中期以来,为研究社会组织 and 结构的变化,揭示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我国学者与美、加、澳等国的学者合作,在安阳殷墟所在的洹河流域、夏代后期和商代早期都城所在的伊洛河流域、内蒙古半支箭河流域、山东半岛东南部等地开展了系统的聚落群调查,新发现了大量遗址,并对仰韶时期、龙山时期、夏代、商代和周代遗址的数量、规模的变化

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并对其背景和原因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聚落形态研究已经显示出其在研究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和广阔的前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就是把聚落形态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尤其是把中心性城邑及其布局的变化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看出,聚落形态的变化,尤其是大型中心性聚落的出现和消失,是与该地区聚落的整体数量和规模的变化的趋势相一致的。事实雄辩地证明,聚落形态研究确实是探索古代社会组织与结构变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五)注重各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

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过程。要研究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首先必须充分研究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的自然环境、经济形态、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各地区迈向文明社会的进程(我们叫做“文明化进程”)也各具特点。因此,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首先应当对各个地区的文明进程进行研究,并探讨其各自的特点,进而分析其产生这些特点的背景与原因及该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正是基于这一思路,近5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与一些大学和地方研究机构合作,分别在上海、武汉、成都、济南、郑州、徐州、大连和合肥等地召开了长江下游、中游、上游,黄河中游和下游,淮河流域,辽河流域,江淮地区等地区的文明化进程研讨会,与会学者达600多人次。这一系列的研讨会有力地促进了各个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使我们可以对各个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为进一步研究“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六)重视研究礼制的产生、发展及作用

世界各地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过程都有其特点。作为中国学者,揭示中华文明的特点,阐释产生的原因,是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在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提出,礼制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也是其突出特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与礼制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的。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离不开对礼制形成和发展的探讨。各地发现的丰富的考古资料为探讨礼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七)重视环境变化对中华文明演进过程的影响

随着环境科学的发展和环境对人类生活影响的不断彰显,环境变化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一些从事环境研究的学者积极地参与到古代环境变化的研究之中,与考古学、历史学的学者一道,共同研究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时期人类的生活乃至社会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就把环境的变化及其与文明起源的关系作为重点课题,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果。根据现有的资料和研究来看,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几个关键的时期,自然环境确实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这一现象值得注意,两者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八)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新趋势——逐步转向文明演进的背景、动力及其特点等深层次的研究

上个世纪,国内关于文明起源研究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对中华文明的要素及其起源的追溯和各地区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上,而对中华文明演进的背景、动力、模式和机制及其特点等深层次问题却较少涉及。近年来,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变。一些学者致力于对中华

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及其阶段性,文明演进的道路、背景、动力、机制等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如重视文明形成动力的研究,具体分析战争、原始宗教与祭祀、资源控制、各地区势力集团之间的互动、先进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及文化的传播和吸收等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目前掌握的资料和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决不能用某一原因的单独作用来解释,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具体分析各种因素在这一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我认为,上述这些研究的新动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世纪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方向,也是与国际学术界对文明起源研究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的。

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第一阶段)的主要收获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基础上,2004年夏季,在李长春同志的关怀和科技部的支持和组织下,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的立项报告获得批准,至此,该项目正式启动。

(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概况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考虑到这一项目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广,参与的单位和学科多,研究的内容复杂,项目的组织和实施难度较大,按照科技部的指示,首先进行了为期3年(2001—2003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预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预研究结束后,科技部决定,正式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由于当时“十五”计划仅剩两年的时间,科技部同意项目承担单位的建议,将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的研究范围确定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的中原地区。之所以考虑将中原地区作为第一阶段的研究对象,一是探源工程预研究就是选择了这一区域,有预研究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该地区考古工作起步最早,70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考古资料,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较为充分,考古学文化发展的脉络较为清晰,有关文明起源的研究基础也比较好;加之该地区是夏、商王朝的诞生地,流传下来较多的古史传说和历史文献可以作为研究的参考,这些都有利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的顺利实施。

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的正式名称是“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项目的方针和目标是,多学科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地研究中华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并初步探索其背景与原因。本项目由科技部作为第一组织单位,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也是组织单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项目第一执行单位,北京大学作为第二执行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郑州大学等单位参加了项目的工作。参加项目的学科包括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古文字学、人类学、科学测年、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冶金史、化学成分分析、古人类食谱分析、遥感和遗址的物理探测、天文学、科技史等多个学科。在实施过程中,各个学科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联合攻关,探讨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时期的环境背景、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各个都邑性遗址的年

代关系、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期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形态等问题。

由于只有两年的时间,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对预研究设置的课题进行了取舍,共设立了如下5个研究课题:

1. 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相关考古学文化分期谱系的精确测年;
2. 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的自然环境研究;
3. 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
4. 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状况研究;
5. 综合与总结——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

(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的主要收获

经过项目各承担单位、各相关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1. 文化谱系与年代测定课题:对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新密新砦、河南偃师二里头等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中心性遗址出土的系列碳样标本进行了加速器 and 常规方法的碳十四精确测年,为研究这些遗址的相互关系以及当时中原地区文化与社会的发展状况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测年数据。

2. 自然环境变迁课题:对豫西晋南地区的自然环境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对从豫西的寺河南和晋南的太子滩两个地点的自然沉积剖面中采集的系列土壤样品进行了年代测定、孢粉分析和磁化率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结合对在陶寺、王城岗、新砦等遗址文化层获取的孢粉分析以及对木炭碎块进行的显微镜观察树种分析,初步认识了当时豫西和晋南地区的气候特征和植被状况,初步复原了遗址所处地点的原生地地貌和变化情况以及当时的自然环境和可能发生过的灾害事件,为研究气候演变与文化发展和文明演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初步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元前2500—2100年期间,中原地区的气候较为温暖湿润,适合农业的发展。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黄河中游地区曾有一个气候较为异常的时期,其主要表现为温度的变化尤其是降雨量的不均衡。这一研究结果不禁使我们联想起古史中关于尧舜禹时期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的记载。目前,该地区的气候变化与文明进程之间的关系只是找到了一些线索,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我认为,气候环境的变化对文明演进的影响主要是背景层面的,它可能不是中原地区夏王朝崛起的唯一或最为重要的原因。^①

3. 经济技术发展状况课题:应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四处重点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人工遗物及相关遗迹进行研究,阐明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这个特定时间段里中原地区包括农耕生产,家畜饲养,陶器、玉器和青铜器制作等在内的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与文明演进的关系。

研究成果表明,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期间,中原地区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生产部门——农业(包括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以及最能反映当时技术水平的加工制作业(包括青铜器制作、陶器制作、石器制作、玉器加工等)都呈现出显著的变化和进步,其中尤

^① 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突变原因探析》,《考古》2004年第1期。

以发生在由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文化演变过程中的变化最为明显。

在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文化演变过程中,农业生产在保持原有传统的基础上(即以粟类作物为代表的农耕生产和以家猪为代表的家畜饲养)开始普遍地种植水稻和饲养黄牛,与此同时,起源于西亚的小麦和绵羊也传入了中原地区,由此逐步建立起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和多种家畜饲养方式。这种跃进式的农业发展在当时主要生产工具——石器类型的变化上也有体现,例如与石斧、石铲等多功能生产工具相比,石刀、石镰等收割用工具所占的比重显著增加。同样是在这一时期,金属制造业在原有的砷铜冶炼技术的基础上发展出了锡(铅)青铜冶炼技术,后者很快成为我国青铜时代冶铸业的重要特色之一。这一时期,陶器制作和玉器加工的技术也有了很大发展,例如制陶可能开始采用集中烧制的方法,为陶器制造业的商品化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原始瓷器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玉器加工开始采用琢制、锯切割、管钻穿孔和研磨抛光等一系列比较先进的技术手段。

在二里头文化向二里岗文化(即夏代末期向商代早期)的演变过程中,经济技术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例如作为优良农作物的小麦的种植规模有较大幅度提升。当地的农业种植制度逐步由依赖产量较低的粟和黍向种植包括较高产且口感好的小麦和稻在内的多种农作物的方向转化。小麦在商代农业生产中地位的提高,是当时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预示着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种植制度的一次较大变化即将到来。

农业的发展应该是古代文明形成的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本课题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即由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文化演变的时期,中原地区的古代农业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和跃进式的发展。无独有偶,在文明初期阶段对经济和社会都具有重大影响的青铜器冶炼技术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完善的。这再次证明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促进古代文明形成的重要动因之一^①。该课题的显著进展充分显示出多学科结合在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巨大潜力。

4. 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课题:通过对陶寺、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几座都邑性遗址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对这些中心性遗址的修建、使用和废弃年代、布局、功能区分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王权发展程度有了不同程度的新认识。

(1) 在据古史传说是尧活动中心地区的山西南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近年在襄汾陶寺遗址新发现了距今约4300—4000年的大型城址,其中早期的城址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约为58万平方米。到了中期(约距今4100年前后),建成了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在早期小城南部,发现了一个高等级居住区,这里发现了规模达上千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出土了迄今年代最早的陶制建筑材料(“瓦”)和精美的刻花墙皮。在高等级居住区以南,发现了集中于一处的十余座直径达十米左右的大型窖穴,很可能是为城内统治者控制的仓储区。在中期大城的南端,发现了以围墙围绕的区域,其内部发掘了有上百件精美玉器、漆器、陶器的随葬品的大型墓葬和出土数十件随葬品的中型墓葬^②。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在大型墓的附近发现了一个

^① 袁靖:《探源工程经济技术课题的主要成果发展》,《中国文物报》2006年11月。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2002年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3年第5期;《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平面呈大半圆形的特殊遗迹。从该半圆的圆心外侧的半圆形夯土墙的有意留出的几道缝隙中向东望去,恰好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太阳从遗址以东的帽儿山升起的位置。发掘者和天文学家都认为,这个遗迹很有可能是与观测太阳的位置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节气的活动有关的观测天象和举行祭祀的场所^①,让人联想起《尚书·尧典》中关于尧“观象授时”的记载。

陶寺城址的规模比夏代后期的都城二里头遗址小约 100 万平方米,而与全国各地发现的早于夏代的城址相比,则要大一倍乃至数倍之多,颇有傲视群雄之气势。陶寺城址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城内功能分区明显。高级贵族居住区与社会下层居住区相隔绝,并已出现专门为上层贵族所掌控的仓储区和墓葬及祭祀区,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阶层分化,城内的统治集团已经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和祭祀权,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主宰,已经具有“王”的雏形。课题组认为,至迟在陶寺文化中期,已经进入到早期国家的阶段。

(2) 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小城遗址,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发现面积在 1 万平方米左右的小城。当时,发掘者提出该城有可能是文献传说记载的“禹都阳城”^②。但是,该城区 1 万平方米的规模使学术界普遍感到难以与禹都阳城相联系。在探源工程中,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组成的子课题组在小城的西部发现了面积约 30 万平方米、城外护城壕与小城外侧的壕沟相连的大型城址,其建造年代与小城大体同时,均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③,约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王城岗遗址一带过去出土的战国时期砖瓦,上有“阳城”的铭文,可知这一带战国时期曾称阳城。这次新发现的城址的位置和年代与夏禹活动的时期和地域基本吻合,规模又达到 30 万平方米,从而为寻找阳城找到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在城内发现夯土基址的线索,其规模、结构有待下一步的工作。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南新密新砦遗址新发现了面积达 70 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城外有大型护城壕。城内发现了面积在 1000 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遗迹^④。根据现场的观察和对其功能的分析,课题承担者推测可能是当时的人们从事公共活动的场所。如此规模的城址和遗迹在迄今发现的同时期遗存中首屈一指。该城址的年代略晚于王城岗遗址,早于二里头遗址成为都城的年代。这个城址的发现,填补了二里头遗址之前夏代都邑遗址的空白,为研究夏代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4)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代后期的都邑。自 1959 年被发现以来,中国社会科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考古》2004 年第 2 期;《2004—2005 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5 年第 10 期。席泽宗、江晓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天文观测遗迹功能讨论》,《考古》2006 年第 11 期。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年。

③ 方燕明:《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新发现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5 年第 9 期。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等:《河南登封市王城岗遗址 2002、2004 年发掘简报》,《考古》2006 年第 9 期。

④ 赵春青等:《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发现城墙和大型建筑》,《中国文物报》2004 年 3 月 3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中心区发现大型浅穴式建筑》,《考古》2006 年第 1 期。

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几代学者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相继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及铸铜作坊。但是,对该都城的布局一直缺乏总体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近几年,这方面终于有了突破:在都邑的中部发现了宫殿较为集中的区域,其周围以宽10—20米的道路围绕;在路面上发现了迄今最早的车辙(两轮之间的距离为1米,应非马车)。大约在都城被使用了数十年后,在围绕宫殿区的道路内侧修建了宽2米,边长300多米,面积达10.8万平方米的宫城;宫城内部又修建了一批宫殿建筑。宫城的城门处修建有门楼。宫殿建筑多呈“四合院”式结构,多数宫殿的正殿坐北朝南,其两侧的厢房东西对称,可以看出已经具有中轴线理念的雏形。有些建筑为前后相连递进的院落。这一发现将我国古代宫殿(包括故宫紫禁城)建筑的中轴线贯穿、左右建筑对称、院落前后递进的布局特点出现的年代上溯至距今3700多年前的夏代后期。另外,在一座大型建筑的院落内,发现了数座贵族墓葬。其中的一座墓葬中,发现了用2000多片细小规整的绿松石片镶嵌而成,长达60多公分的龙形遗物。该龙形器形象逼真,造型生动,反映了高超的工艺技术^①。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宫殿区的重要发现入选“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在宫城的南墙以南,又发现了一个由围墙围绕的区域,里面未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却发现了铜器和绿松石等仅为高级权贵阶层所使用的奢侈品制作作坊。有迹象表明,这一区域极有可能是王室直接控制的手工业作坊区。探源工程实施期间二里头遗址的一些重要发现,如宫城的出现、宫殿的规模和中轴线布局理念的形成、作为等级身份主要象征物——礼器的青铜容器、玉石仪仗用具、绿松石镶嵌物品的出现及其制作业的垄断等,都极有价值。二里头遗址的一系列重要发现表明,在夏代后期,王权的强化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特别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宫城的出现、中轴线理念的形成和宫殿封闭的布局,均开后世都城及宫室制度的先河,反映出当时的城市化以及王权和国家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与此同时,课题组成员还在这几处中心性城邑周围地区进行了“拉网式”的聚落分布状况调查。新发现的遗址达174处,数量竟达到此前已发现遗址数量(48处)的3.625倍^②!聚落分布调查的结果使我们可以将这些中心性城邑与周围同时存在的中小型遗址联系起来考虑当时的社会结构。

此课题的成果充分显示出对中心性城邑遗址重要区域的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和有计划的区域调查是研究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有效途径^③。

5. 综合与总结课题:对目前国外学术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分析和评述;对国内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对涉及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如文明与文化、文明与国家、文明形成的标志、文明形态和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对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的文明演进过程进行了研究;为“十一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05年第7期。许宏等:《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考古》2004年第11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洛阳盆地2001—2003年考古调查简报》,《考古》2005年第5期。

^③ 王巍:《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文物》2006年第5期。

五”期间全面开展中华探源工程制订了实施方案。

(1)国外关于文明起源理论研究现状评述:一般认为世界上有几大古老的文明起源中心,如古代中国、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中美洲等。国际学术界对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中美洲等地区的文明起源研究,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许多有关文明起源的理论,还有相当数量的研究个案。本专题的成果为一部专著《国外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与实践》^①。书中对国外有关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和个案研究的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分析,并对其在进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所具有的参考作用和价值进行了评述,这对学术界全面了解国外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开阔思路,借鉴其理论方法,促进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国内文明起源研究历程的回顾: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已经开展了几十年,形成了上千种研究成果。本子课题的成果也是一部专著——《中国文明起源研究》。^②书中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模式与特征、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与地区,以及对中原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中游地区、环太湖地区、西辽河地区的文明起源研究,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和总结,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发展历程、现状和发展趋势提出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为今后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3)有关文明起源理论的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以及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都涉及理论问题,没有相应的理论,就难以形成成熟的研究结论。本专题对有关文明起源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涉及的问题主要有:文明的定义、文明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文明与国家的关系,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关系,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时间和标志,研究文明起源研究所应采取的理念、技术路线和方法等。^③

(4)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间中原地区的文明形态综合研究:对前4个课题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从年代和文化谱系、聚落形态、埋葬制度、经济技术、生态环境变化等不同的侧面,分析了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间中原地区文明演进的状况,并对导致该演进过程的背景、动力、机制、模式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5)“十一五”期间全面开展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研究实施方案的制订: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主的20多位学者为期半年的共同努力,完成了“十一五”期间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方案的征求意见稿,经过征求在京40余位学者的意见并进行数次修改后,最终完成了实施方案,并提交给了科技部。方案内容包括:全面开展探源工程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前期研究基础、有利条件和存在困难、工程的宗旨与目标、实施方法与途径、研究领域与课题设置、所需经费等。

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的结果表明,以国家工程的形式,集中相关学科的精兵强将,以中

① 陈淳:《国外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待刊。

② 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③ 王巍:《试论文明与国家概念的异同》,《古代文明研究》第一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关于华夏文明形成的几个问题》,《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论纲》,《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几个问题》,《首届中瑞考古论坛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心性聚落遗址的布局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为重点,以心性聚落遗址周围地区聚落分布的区域调查为基本手段,结合对都邑性遗址重点区域进行适当规模的考古发掘和利用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开展气候环境和经济技术发展等课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在“十一五”期间,将这一成功做法推向全国,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将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三)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

探源工程第二阶段为期3年,即从2006年初到2008年底。第二阶段将在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将研究的空间范围扩大到率先开始文明化进程的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及辽河流域,将在“多元一体”理论的指导下,对这些地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文化与文明进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在碳十四测年和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所确定的精准时空框架内,通过对社会结构和人类精神文化变化的多学科研究,进一步探索中华文明产生和早期发展的多元一体化过程及其环境背景与技术和经济基础。本项目拟分解为“3500BC—1500BC各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年代研究”、“3500BC—1500BC各地区的环境研究”、“3500BC—1500BC各地区的技术和经济发展状况研究”以及“3500BC—1500BC的社会与文化研究”等四项课题。

三、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主要认识分歧

(一)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和进展,但仍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在文明起源理论方面较为薄弱。部分学者不大熟悉国外学术界有关文明起源理论的新进展;少数人用中国的资料来套用国外的某些理论,令人有削足适履的感觉。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国家起源和人类社会发展观点,有些人机械地照搬,有些人则简单地否定,缺乏从中华文明演进的丰富资料中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明起源研究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体系的意识。

在有关的考古资料中,对高等级贵族墓地的发掘和对出土的精美随葬品的研究较为重视,而对聚落的发掘和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聚落群分布状况的区域调查还很不普遍。比较典型的例证是,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大型积石冢、祭坛十分引人注目,但是对该地区同时期聚落遗址的状况却几乎一无所知。

在对聚落遗址尤其是一些城址的发掘和研究中,往往由于经费、人力等条件的限制,只挖几条探沟,解决了城址的年代问题,便停止了工作,对了解当时社会状况更为重要的城内布局所知甚少,从而极大地限制了这些城址在各地文明化进程乃至整个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作用的发挥。

相对而言,研究者对于一些中心性城邑遗址和大型墓葬高等级的遗存较为关注,而对一般聚落和社会基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关注不够,影响了全方位、多层次地认识当时社会的全貌。

虽然以探源工程为代表的项目在多学科结合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全国范围来说,在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多学科结合仍比较薄弱,一些已经在国际学术界较为广泛使用的新技术新方法尚未在全国范围全面应用。

从总体上看,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中,较为重视社会分化、等级制度、权力构成等制度文明的层面,对于作为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的经济和工艺技术的发展变化,对于气候环境的变化与人类活动及文明演进关系的研究,对作为维护王权重要工具的意识形态——“礼”的形成、发展与传播,各地区的互动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等重大问题还需要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二)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研究中存在的主要认识分歧

在有关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主要有:

1. 中华文明的起源从何时算起?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苏秉琦曾提出“一万年(前)起步”的观点,就是说以农业的出现和新石器时代的开始作为文明起源的起始时期。国内多数学者则认为,文明起源应以农业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社会出现较为明显的阶层分化为标志。按照这一观点,中华文明起源应以公元前 3500 年左右为起始点。我认为,农业的出现和发展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如果把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比喻为一部交响乐的话,农业的出现,应当是奏响了这一交响乐的第一个音符,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是应视作这部交响乐的序曲,而从公元前 3500 年开始,则进入了这部交响乐的第一乐章。

2. 古代中国什么时候开始进入文明社会? 夏代是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 中国历史上的“古国”或“邦国”是否是早期国家?

国内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夏代是文明社会的开始,夏、商、西周时期是中国的早期国家阶段,而夏代之前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等所处的社会是原始社会的末期,尚未进入文明社会。在国外,至今仍有不少学者怀疑夏王朝的存在,认为中国最早的王朝是商王朝,商代是古代中国最早的文明社会。近年来,随着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代考古学研究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熟悉中国考古学的国外学者逐渐同意中国学者关于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遗存是夏王朝的文化遗存,夏代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的观点。这些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夏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红山文化的“祭坛”、“大型积石冢”和“女神庙”的发现,良渚文化的极有可能与祭祀有关、面积达数千平方米超大规模的建筑基址和有近百件精美玉器随葬品的高级贵族墓葬的发现,使学术界对这些文化遗存所反映的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发展阶段的认识出现了明显分歧。国内一些学者提出,红山文化也已经进入了古国的时期,而古国是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①。有的学者明确提出,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已从史前的氏族组织,蜕变成了政权,进入到了国家的时期”^②。按照这样的观点,中华文明形成于距今约五千年前。相当一部分考古学者特别是从事历史时期(夏商周及其以后)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和绝大多

① 苏秉琦:《中华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

② 张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文物》1995 年第 5 期。